

治理“职业弹幕人”，营造清朗网购环境

“职业弹幕人”如何作乱

今年6月,北京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直播销售“燃咔果冻”,直播间里“3颗就瘦3.2斤”等夸张弹幕不断刷屏,吸引消费者。然而执法人员发现,该公司购买第三方服务,雇佣“职业弹幕人”批量发送虚假弹幕。这些“职业弹幕人”在直播等互动场景中,批量发布事先写好的弹幕评论,虚构产品功效和用户评价,制造虚假流量。

“职业弹幕人”本质是“网络水军”。在直播行业,头部主播占据大部分流量,中小主播为差异化竞争,会误导电商平台推荐算法,优先推送其直播间。同时,消费者网购依赖他人体验做决策,集体性好评氛围、主播极具感染力的推销,都会压缩消费者理性思考时间,形成“不买就亏”的心理暗示,为“职业弹幕人”提供了生存土壤。

多维度危害不容小觑

“职业弹幕人”危害是多维度的。从市场秩序看,它会误导电商平台推荐算法,导致“劣币驱逐良币”,破坏网络购物秩序与环境。有研究机构



近日,北京市市场监管局对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开出10万元罚单,成功查办全国市场监管领域直播电商“职业弹幕人”首案,引发关注。

预计,我国直播电商市场在2024年至2026年年复合增长率将达到18%,若不治理“职业弹幕人”,将严重影响行业健康发展。

从网络诚信体系看,“职业弹幕人”极易透支公众对网络信息内容、平台和企业的信任。严女士的母亲,在直播间看到很多人发弹幕说羊奶粉好喝营养又健康,便购买了,之后又在别的直播间买黄芪。类似事件不断发生,损害了消费者权益,也破坏了网络诚信环境。

灰色产业链与法律责任

“职业弹幕人”已形成相对完备的灰色产业链。2021年,有媒体调查发现部分个人用户兜售刷弹幕软件;2023年,安徽亳州警方打击了一个非法经营犯罪的“职业弹幕人”团伙,该团伙假扮商贸公司,招聘员工养号,一人操作

多台手机刷好评弹幕。

律师马丽红指出,“职业弹幕人”行为至少触及4部法律底线。它违反新修订的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九条,属于虚假宣传,团队作为协助者可能承担连带责任;违反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十条,侵害消费者知情权和选择权;违反网络安全法第二十四条,批量操控非实名账号发布内容,平台若未履行审核义务也需担责;若以营利为目的,长期大规模从事此类活动且经营数额达到一定标准,可能触犯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的非法经营罪;若虚假宣传行为情节严重,还可能构成刑法第二百二十二条的虚假广告罪。

多方合力治理乱象

治理“职业弹幕人”乱象应从行政监管、平台管理与网络自律等多个维度入手,对不当引导行为加以规制。近年

来,相关部门持续开展打击整治“网络水军”专项行动,取得显著成效。北京市市场监管综合执法总队将直播刷评行为纳入“编造用户评价”执法框架,为同类案件提供法律适用范本,还突破技术壁垒,为后续处理类似事件提供依据。

平台作为直接管理方,要强化管理力度。可升级AI识别系统,实时拦截高频重复、关键词堆砌的弹幕;严格执行账号实名制,对异常账号采取限流、封号等措施;建立弹幕内容追溯机制,确保每条评论可查可溯源。同时,针对点击量高、成交量虚高、“打赏”金额大的直播间,建立人机结合的重点监督审核机制,对头部直播间、主播及账号进行重点管理。

消费者也要提高警惕。各年龄段消费者都可能误中“职业弹幕人”圈套,要谨慎对待低价商品,警惕绝对性话术和模板化好评。购买后保留交易凭证和商品证据,一旦发现问题,及时向有关部门和网络平台寻求帮助。

(摘自《人民日报》海外版9.22)

暴走团里的老年江湖

批评“缺乏公德”。面对争论,老人们委屈又无奈,多数人仍坚持赴约,也有个别老人因怕尴尬或受不了异样眼光选择退出。

暴走团内部的“江湖纷争”

对老人们而言,北陵公园不仅是锻炼场所,更是重新构建社交圈的重要去处。随着规模变大,队伍管理成了难题。起初大家随意站位,后来前排成了“香饽饽”,一些曾是管理层的成员格外在意站位,甚至提前占位。暴走团设有领队、后勤组长等职务,每三个月投票产生。领队一职因为有权成为最受欢迎的职务,老人们为“争夺”领队暗自较劲。

除了站位和职务争夺,“钱”和“利”也是矛盾根源。王建国(化名)是暴走团元老,

担任后勤组长后,在购买队服上与李华产生分歧。王建国频繁安排换新队服却不公开进货单据,被怀疑拿回扣。后

来趁着李华去三亚过冬,王建国私自收取团员会费,导致十几人退出。两人最终因理念不合而分道扬镳。

加入暴走团原因各不相同

暴走团成员大多是退休老人,离开工作岗位后,日子闲了下来,健步走成了生活中为数不多的盼头。李华曾是中学语文教师,退休后生活清闲却失落,时间变得冗长难熬。团队中的梅阿姨从农村来到沈阳帮儿子带孙辈,孩子上小学后生活突然空出大块,虽与女儿同住却仍感到孤独。

促使老人加入暴走团的原因各不相同,但孤独是共通原因之一。北陵公园给了李华新的寄托,他几乎把所有时间和精力投注于此。梅阿姨在暴走团找回自我,精神上有了寄托。锻炼之余,老人们三五一群聊天、教玩手机、讲见闻,背后有更深层的情感需求——证明自己依然健康、

独立,能自主融入社会。

暴走团行为被逐渐规范

然而,暴走团也面临着诸多矛盾。今年8月“暴走团挡路”的新闻事件将其推向舆论旋涡。

为此,多地政府陆续出台规范措施,对暴走团进行摸排登记,划定活动区域,安排专人维持秩序。专家认为,暴走团引发的争议,既源于自身交通安全意识薄弱,组织松散纪律性不足等主观因素,也与公共健身空间不足、缺乏有效监管等客观条件相关。建议加强体育设施规划与建设,出台规范性指导意见,引导暴走团选择合适时间与场地活动。

2025年夏末,沈阳公园加强安保巡逻,劝阻占道暴走行为,禁止高分贝音响播放。许多暴走团主动调整活动地点,转战到相对僻静的场所。李华所在的团队也进行了调整,队伍虽比鼎盛时短了不少,但留下的人依旧穿着统一服装,迈着整齐步子暴走。(摘自《新京报》9.16 咸运祯/文)



2025年9月
23
星期二
乙巳年八月初二
总第 3489 期 (今日 16 版)
湖南日报报业集团主管
® 华声在线股份有限公司主办、出版
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:CN 43-0032
邮发代号:41-13 总编辑:盛伟山
全国邮政投递服务热线:11185
本报邮箱:web-bwb@163.com



导
读
4 版
“密苏里”号受降仪式上的中国面孔

7 版
致命“化骨水”氢氟酸到底是啥

15 版
烟花秀为何在喜马拉雅山脉“炸响”

16 版
治理“职业弹幕人”,营造清朗网购环境

他们因何被撤销了科技奖励

2025年9月19日,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发布公告称,因存在违纪违法、科研失信行为,撤销周新源、陈哲宇、孙倍成、赵远锦所获中国青年科技奖,撤销刘建妮所获中国青年女科学家奖,收回五人所获奖章、证书和奖金。

这应该是这两个奖项设立以来,首次出现颁发的奖项被撤销的情况。五人的获奖时间,分别在2004年至2022年之间,从获奖到撤销的最长时间跨度长达21年,从追溯时间来看,惩罚颇为严厉。

中国青年科技奖,每两年评选一次,每次获奖人不超过100名,旨在表彰在国家经济发展、社会进步和科技创新中作出突出贡献的青年科技人才。截至2024年,该奖项共有1804

位青年科技工作者获奖,其中约有190位获奖者当选为两院院士,占比约10%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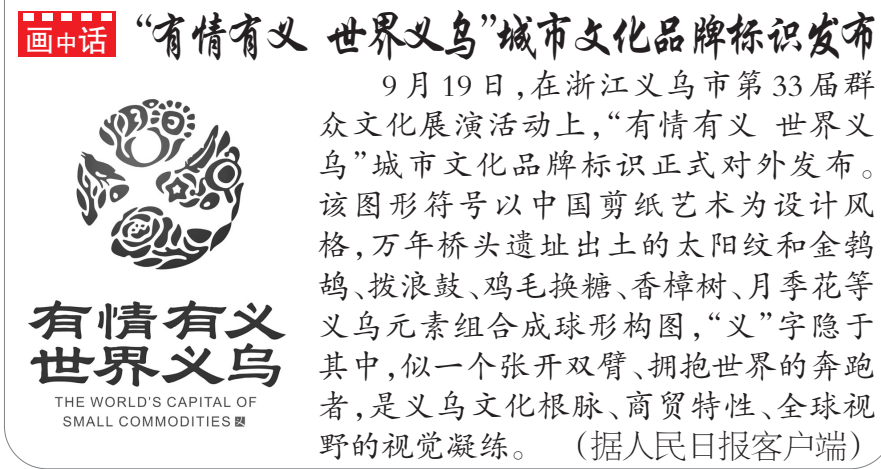
中国青年女科学家奖,自2004年起每年评选一次,旨在表彰面向世界科技前沿、面向经济主战场、面向国家重大需求、面向人民生命健康,在相关科技创新领域作出突出贡献的青年女科技工作者和团队。截至2024年,该奖项累计授予204名女科技工作者和19个科技工作者团队,其中有9人当选为两院院士。

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的上述公告,没有明确指出上述五人具体的科研失信行为。记者通过公开资料查询发现,周新源、陈哲宇是因为违法犯罪;孙倍成、赵远锦、刘建妮是因为科研失信,主要是请托问题。更为戏剧性的是,赵远锦还是孙倍成的请托对象。

遵纪守法,是公民的底线;科研诚信,是科研人员品质的试金石,更是确保科技事业健康、可持续发展的重中之重。

知错能改,善莫大焉!希望以上五个被撤销的奖项,能让更多人引以为鉴。

(摘自《南方周末》9.21)



“猪肉佬”的“爱心之家”,撑起千余名孩子的求学路

在粤北山区的薄雾中,清晨五点多,67岁的邓卫星已准时出现在广东省英德市下太镇农贸市场。这位曾被誉为“中国好人”的猪肉摊主,用四十余载光阴为1000多名深山学子筑起温暖港湾。

1981年,当邓卫星发现一个爱读书却因为路远而失学的孩子,他和妻子将自家两层小楼改造成“爱心驿站”。从此,这座普通民宅成为七十多个自然村困难学童的第二个家。凌晨两三点宰猪卖肉,清

晨五点准备早餐,深夜教导孩子们为人处世,这对“猪肉佬”夫妇用微薄收入撑起孩子们的求学路。“最热闹时有几十个孩子同吃同住。”邓卫星指着墙上发黄的照片回忆,“看着他们从够不着灶台,到考上大学走出大山,就像自家孩子长大成人一样感到欣慰。”

随着经济的发展以及脱贫攻坚战全面胜利,2021年在省市各级政府支持下,邓卫星的家正式挂牌“爱心之家”,这位年过花甲的老人开启了人

生新篇章。褪去“大家长”身份的他,如今身兼多职:清晨仍是猪肉摊前麻利的“邓师傅”,午后化身“爱心之家”讲解员,更多时候则是忙着了解“孩子们”的生活学习情况。

“以前是给孩子们一个家,现在是让更多人懂得怎么建好‘家’。”邓卫星说。如今,他的事迹被制作成展板在“爱心之家”展示,每年都有人来此处参观,好人精神正传递给一代又一代人。(摘自《南风窗》)

责编:黄明 杨海英 版式:曾善美 校对:胡永龙